

贪官缘何多“干亲”?

宛诗平

据最高检消息,山东省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近日被提起公诉。据悉,包括王敏在内,至少有6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都与同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房地产商赵晋。被赵晋坑了的6老虎中3人是他“爹”。(2月18日《法制晚报》)

“打干亲”本是一种民俗现象,它源于封建时代的传统宗亲制度。当亲族关系难以满足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立足的需要时,人们便会到亲族之外寻求可以相互信赖、相互帮助的类型亲属的社会关系,这时,“打干亲”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打干亲”这种原本是一个值得认同的民间习俗,却渐渐地变了味,俨然成了拉关系、搞特殊的灰色词。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贪官当中,就不乏“干亲”成串,甚至被“干亲”拉

下水者。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向广西、四川等地方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曾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为什么四川多发此类“打干亲”问题呢?这源于四川有深厚的“袍哥”文化,而“袍哥”文化衍生出的“打干亲”现象也被四川省委王书记列为“十类问题现象”之一,为此去年12月,四川省泸州市纪委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干部认真自查“打干亲”问题,有干亲关系的必须立即解除,领导干部要做出不“打干亲”承诺书。

“打干亲”这种习俗如果只是民间、在老百姓中间存在,其实未尝不可。但倘若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面,也有人热衷于认“干亲”,攀亲家,就有些变味。当党员干部之间,或党员干部与各种社会关系之间,互相“打干亲”,攀高结贵之后,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微妙而难以割舍。或在干部任用、人事安排、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诸多方面,给“干亲”大开

方便之门;或以“干亲”关系为掩护,以亲情间“礼尚往来”为借口,收送红包礼金;或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投标、政府项目经营管理等,为“干亲”谋取不当利益;甚至与“干亲”合伙经商办企业,搞买官卖官……

贪官缘何多“干亲”?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多“亲”,而是缘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太诱人,缘于权力失去了约束与监督。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干亲”。纵观官场中各种各样的“打干亲”现象,不论是权色交易型“打干亲”,狐假虎威式“打干亲”,拉帮结派“小圈子”式“打干亲”,还是行贿方便型“打干亲”,都是在以“干亲”马甲掩饰个人私欲,并将原本陌生的关系镀上唯亲的借口。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法庭上曾陈述:“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失去了界线,失去了防线。”的确,季建业的“朋友圈”真是够乱的,有商界的大老板,还有一个“干妹妹”。季

建业的“干妹妹”祝某攀上季建业这根高枝,看中的即是他手中的权力。因此,坊间所议论的祝某“干妹妹”的身份也罢,情妇也好,实则是权力的捐客。祝某的色相换取的,是季建业大肆出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遏制官场“打干亲”现象,当然需要各级官员头脑清醒,保持警惕,但关键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方面,必须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抵制“圈子文化”,纯洁权力关系,坚决查处腐败问题,形成强大的震慑效果,形成不敢拉帮结派,不取任人唯亲的氛围。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法律与制度的顶层设计,以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确保权力运作透明化,让拉帮结派、关系攀附无利可图,官员想贪腐也贪腐不成,想为“干亲”牟取利益也要大费周折,倘若如此,也就无需担忧官员“打干亲”了。

慈善机构领养“爱心墙”可实现双赢

吴汶洁

近日,昆明北站隧道“爱心墙”因缺乏后续管理,堆满了不能再使用的脏旧衣物,俨然成为一个垃圾场,社区工作人员随之进行了清理,引发了社会的关注。(2月18日《京华时报》)

“爱心墙”源自伊朗,在国内落后地引起巨大反响,首先呈现的就是一面倒的赞赏之词,但显然“爱心墙”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各地的社会反响、发展现状也不尽如人意,那么,这个“舶来品”在国内要怎样才能继续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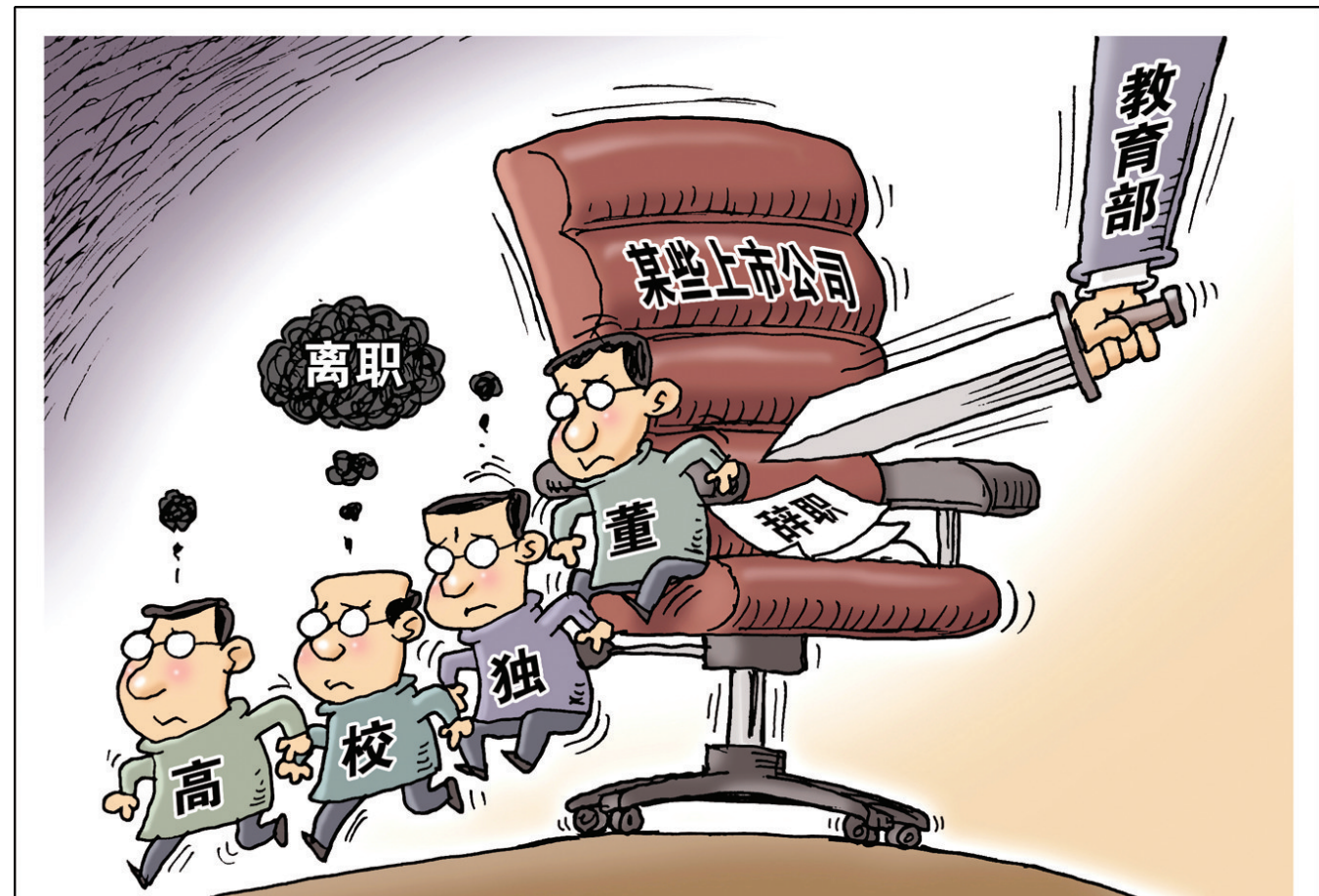
除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管理机制进行各环节的把控外,让国内已有的慈善组织领养“爱心墙”更是一种双赢。

目前国内有不少成立已久的慈善组织,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本身已成长为一个有序持久的管理程序,人才构成、运行机制都比较成熟,同时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供“爱心墙”的发展所借鉴,如果二者能够联合起来,对慈善组织来说是一种自我的创新,能够更多地调动社会闲置资源,对“爱心墙”来说则是更好的生存方式,能够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传递温暖。

舶来品如果一成不变,只是照搬过来是没有前途的,要想长久发展就要结合本土实际进行适当的改革创新。目前,“爱心墙”在国内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管理的缺失,因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捐献物质量参差不齐,安全卫生没有保障、保管不当、领取混乱,直接影响其后续发展,甚至令其夭折。

让慈善组织领养“爱心墙”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将之纳入现有的管理机制,无论是慈善资源的募捐、管理、发放都有章可循,可以迅速改善运行混乱的现状。同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稍有名气的慈善组织都拥有其独特的资源,依靠这些组织,“爱心墙”不仅拥有足够的人力支持进行有效管理,也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募集到社会闲置资源,并对捐献物的卫生质量把关,保障“爱心墙”的持久发展。

最后,并不是只有落后地区才有困难家庭,城市也需要爱心。慈善机构领养“爱心墙”能够完善慈善资源的分配,温暖更多的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城市里设置的“爱心墙”加入到慈善事业当中,社会的整体风貌也提高了,何乐而不为?



清理

2015年四季度以来,教育部掀起高校独董问题监管风暴,润和软件、华信国际、豫金钻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独董春节前集中辞职。“新华视点”记者统计发现,3个多月已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辞职。

据新华社

高铁定价权不等同于一味提价

张传发

正在市场化转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下简称“铁总”)终于拿到了“高铁定价权”。国家发改委近日宣布,从今日起,放开高铁动车票价,改由铁总自行定价,并给于铁总根据市场竞争状况和客流分布等因素实行一定的折扣票价和客流的权力。学界普遍预计,发改委放开高铁票价管制之后,部分热门线路的高铁票价确实存在票价上浮的空间。(2月20日《中国经营报》)

铁总终于拿到了“高铁定价权”!对此,媒体报道的标题里有“提价”的字眼,且还有学界普遍预计的“上浮”一词,沿不知铁总的老总们对此有着怎样的态度。在这儿,我想说的是,高铁定价权≠一味地提价。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核心要义是“市场决定论”,这次国家发改委下放“高铁定价权”,正是在践行“市场决定论”,这一进步是值得肯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发改委手中的“定价项目”越少越好。

铁总拿到了“高铁定价权”,不是说部分热门线路的高铁票价不可以上浮,但,“上浮”不是“定价权”的全部内涵。准确地讲,这里的“定价权”,既包括“上浮”,也包括“下浮”,还包括“维持现有价格不变”。而具体到某一段高铁线路,其票价到底是“上浮”还是“下浮”还是“维持现有价格不变”,且何时“上浮”

而何时“下浮”,何时“维持现有价格不变”,这里头有“市场营销学”。

当然了,部分热门线路,譬如说,“京沪高铁”、“武广高铁”等等,如果是“高朋满座”而“供不应求”,适当地提价,那也是一种“市场调节”;而眼下,事实上,相当多的“冷门线路”,甚至于有的“热门线路”,常有“空椅子旅行”,那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高铁票价的“上浮”与“下浮”应该都是一种新常态,而不是一味地“提价”。

日前,笔者从上海回安徽,在那大巴上,一位女子正打电话,“第一个月别图赚钱,只求开个好头,只求打开市场”——这种“先予后取”的营销思维方式,也同样适用于高铁;既然,高铁上有“空椅子旅行”,为何就不能票价下浮一些呢?其实,有时“票价下浮”,“水往低处流”,一是积累人气,二是不至于浪费,三是“少赚钱总比不赚钱好”。

“高铁定价权”,功夫更在“定价”外。市场上,讲究的是“货真价实”,讲究的是“物美价廉”,也就是说,高铁方面,卖票的前前后后,应该为旅客提供多重的优质服务;这期间,不妨多设一些售票网点,方便老百姓买票,此乃其一;其二,车站内外,不妨多一些“导游服务”,为旅客多提供一些“上车方便”;其三,上车之后,列车上应尽可能为广大旅客多提供一些廉价的餐饮,多提供一些“通讯方便”,多提供一些“娱乐活动”,让大家“于旅行的长河里多舀几瓢快乐,且舀且珍惜”。

总而言之,高铁票价几何,应随行就市,其前提是不玩“空椅子旅行”。

关于“要求干部为父母洗脚”的思考

杜学峰

春节期间,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火烧坪乡政府要求机关干部为父母洗脚并拍照上交,此事被网友质疑形式主义。2月18日下午,火烧坪乡办公室主任覃焯回应称,未通过行政层面强制要求洗脚,“我们反过来问,这种形式你们搞过没有?”(2月19日《新京报》)

昨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火烧坪乡政府要求机关干部为父母洗脚并拍照上交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网友表

示支持,纷纷点赞。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质疑态度,他们认为乡政府的行为过于形式主义,同时也不符合行政强制要求。笔者认为,干部为父母洗脚本无可厚非,之所以引起了网络热议,是因为群众的法治意识增强,监督意识提高所致,其从侧面也反映了国家法治的进步。

的确,火烧坪乡政府在全国来说并不显眼,其要求党员干部为父母洗脚也只是地区性行为,而今在网络上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正是网民素质提高的直接表现。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

程中,只有俯下身来真正去了解民意,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形式主义永远行不通,无论是那些ps下乡照片领导,还是慰问群众摆拍的干部,最后都在群众的监督下沦为笑柄。此外,网友对镇政府行政强制也提出了质疑,这也表明群众的专业性越来越高,对法治建设越来越了解。

因此,政府作为社会的服务者和管理者,理应做好表率作用,不仅要跟上群众脚步,提高自身行政水平,而且要认真实干,把心思放在为民谋实事上。那些热衷形式主义的党员干部不仅逃不过群

众的眼睛,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很有可能被组织抛弃。作为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只有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才会在人民的支持下越走越远。

火烧坪乡政府其实已经回应,并没有行政强制。但是笔者认为,政府为党员干部留的“作业”很好、很贴心。如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说,即使是形式主义,这样的形式我们做到了吗?这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火烧坪乡政府正是用政府的力量为社会尽孝树立榜样,他们可以被质疑,但是更应该被点赞。



教育反腐需要更多“倔强的师者”

张立美

“倔强的师者”,这是河北省遵化市第二中学化学教师陈文艳的微博名。过去的5年间,陈文艳先后经历了举报学校问题、被拘留、被判刑和改判无罪。记者见到陈文艳时,距她重返讲台已经整整5个月了。陈文艳说,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确实很难,但如果再遇到教育腐败,她还会继续举报。(2月19日《京华时报》)

虽然全社会对教育事业、教师有着非常高、理想化的期许,认为这该是一个纯洁的领域、清高的人群。但必须承认的是,现实中的教育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并不比其他领域更清白,升学考试、学生招生、招聘教师、教师职称评聘、教师职务晋升等教育领域的各个环节均存在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腐败。然而,面对教育腐败,纵然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非常痛恨,却由于受到利益的裹挟,基本上选择当沉默的羔羊,不是不拒绝、不反对教育腐败,就是与教育腐败妥协,参与到教育腐败的利益分赃之中,成为教育腐败利益链中的一环。

陈文艳老师选择一条与很多教育工作者不同的道路,面对教育腐败,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当“倔强的师者”,与教育腐败作斗争,进行举报,并遭受牢狱之灾。这种与腐败作斗争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也是这个社会

非常稀缺的精神。教育腐败现象很严重,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涉及的面非常广。仅仅依靠一位“倔强的师者”,最多只能与所在单位存在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对净化整个教育系统的风气作用有限。从这个角度说,教育反腐,不能只是依靠一位“倔强的师者”,而是需要更多“倔强的师者”,需要更多的教师站出来,站出来,不再沉默,也像陈文艳老师一样当“倔强的师者”,举报腐败,与教育腐败作斗争。事实上很多领域腐败严重,特别是前些年腐败风气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扩散,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腐败选择沉默,甚至想着通过腐败、借助腐败谋取私利,即便腐败侵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大多选择妥协接受。

再者,教育腐败,跟其他领域腐败一样,归根结底还是教育各个环节的机制出了问题。升学考试、招人、招老师、职称评聘不阳光、不透明,行政权力过大,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手中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反腐,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走透明阳光道路,限制行政权力,限制教育系统官员手中的权力。

总而言之,教育反腐,整个社会的腐败,既需要完善制度建设,需要纪检部门加大反腐力度,也需要这个社会、教师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倔强的师者”,遇到腐败现象,敢于举报,与之斗争。